

未来十年：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（二）

○ 祁斌



祁斌

全球化浪潮下的竞争力洗牌

为什么美国地震，欧洲垮了？
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向西方国家学习，学习日本、美国、欧洲，当时我们和发达国家差距太大，没有能力分辨他们的异同。今天欧洲的崩溃让很多人非常震惊，改革开放30年后的我们，应该有能力分析欧洲问题的症结，汲取教训，少走弯路。

欧洲经济出现今天这种情况，可以用四个字简单概括，叫做“积重难返”。具体有几个方面的原因。

第一，欧洲的高福利政策。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相互匹配。欧洲的情况是，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，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，所以现在只能往回找。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例子是希腊。我们都知道希腊是高福利，但不知道是怎样的高福利。希腊有一个修道院，里面有很多园丁，他们已经享受了30年的福利，还准备再享受30年。但是最近发现这个修道院其实没有花园，所以园丁全是吃空饷的。看了这个例子大家就容易理解了，为什么这个国家会突然间崩溃。出了问题，要紧缩财政，没有人愿意接受，大家都上街游行。希腊人很有意思，上班的时候不来，罢工的时候都来了，出勤率还挺高，全国超过50%。所以，过度福利对竞争力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。

第二，欧元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。设计欧元的初衷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，希望统一货币能够降低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成本，促进欧洲统

一。但是最初的制度设计，忽视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古训。当不同竞争力的经济体被绑在了一起，很快就陷入了“大锅饭”的泥潭。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被绑在了一起，德意志民族省吃俭用，努力工作，在世界上可能仅次于中国人，而希腊人崇尚享乐，最后希腊经济出了问题，德国人买单；过两天，西班牙出了问题，德国人买单；再过两天，意大利出了问题，还是德国人买单。德国人想明白了，说我也变成希腊人吧，而希腊人变成德国人的几率，大致为零。开玩笑讲，当初欧元的设计或许应该请中国人做个顾问，因为中国人吃过大锅饭，知道大锅饭肯定是要崩溃的。当然欧元也不会真的崩溃，因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溃的后果，历史上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都是欧洲。

第三，欧洲产业的空心化。过去十年、二十年世界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全球化的浪潮，大家可能都看过一本书《世界是平的》。全球化究竟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或许现在才慢慢地清晰起来。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摆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，国家竞争力正在重新洗牌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欧洲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尴尬，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中国、印度、巴西，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。或许欧洲将成为全球化的第一个输家。

瑞典有两个世界名车品牌，萨博和沃尔沃。中国的汽车企业去谈并购，萨博不肯来，已经破产了，沃尔沃被吉利并购，三年后的今天已经扭亏为盈，这是大部分欧洲产业的命运。全球化之前，大家相隔千山万水，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中具有绝对优势，全球化之后，学习变得异常便捷和简单，向新兴国家的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遂势不可挡。

即便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，中长期来看，竞争力也会有很大问题。为什么？除去欧元的困扰外，德国的几大产业，第一，汽车产业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生产基地已经转向中国；第二，化工产业，出于环境和成本的考虑，一定也会向新兴国家转移，不是中国，就是印度，不是印度，就是巴西；然后就是精密制造，在这方面，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，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。我们知道iPhone都是中国的农民工在组装，天津的海鸥手表厂每年向欧美出口几十万个手表机芯。如果不能产业升级，或许用不了多少年，德国人就会没事可做了。

我想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谈论和分析欧洲的这些问题，不是想给大家一个“我们一天天好起来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”的印象，饿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更不是说我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发展水平，而是想表达两层意思：第一，全球化时代来临了，无论你在历史上曾经如何辉煌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，不能转型升级，原来的阵地失去了，新的阵地又找不到，面临的只有无尽的黑夜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欧洲的尴尬刚刚开始。第二，欧洲产业升级不力，源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太低，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，资本市场不发达，缺乏一套支撑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制。而美国有一个硅谷，硅谷后面有一个华尔街。过

去的几十年中，美国的很多产业也已转移到新兴市场，但与欧洲的很大不同是，它能不停地发现新产业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。

历史上的欧洲并不缺乏优秀的科学家。现代科学之父牛顿是英国人，现代互联网之父贝恩是波兰人，他们都是欧洲人。撒切尔夫人说过，欧洲的高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，不是因为欧洲的科技水平低下，而是因为欧洲的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落后。

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是一脉相承、互为因果的。在希腊要裁掉一个人，可能比登天还难，而在华尔街，只要二十分钟，这叫市场化，而这个人可能第二天就能再找到一份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大一场危机，美国经济能够迅速甩掉包袱，轻装前进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危机的震源华尔街，三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。日本最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，年轻人毕业了想去哪里工作？绝大多数要去东芝、索尼，去干什么无所谓，宁可去大公司扫地，也不肯创业，所以日本经济体制不够市场化。无独有偶，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市场化程度不够，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资本市场不发达，所以与欧洲经济相似，日本经济同样有缺乏创新和新兴产业的问题，从“失去的十年”走到“失去的二十年”，可能还会更长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，曾在



欧元



2010年3月28日，瑞典哥德堡，吉利收购沃尔沃签字现场

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，统计了过去五十年间，全球17个经济体，在大大小小84次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。结果发现，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四个国家，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，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、奥地利、葡萄牙、比利时、德国、意大利六个国家，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，其中的几个国家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，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紧密关联。

金融危机后，美欧经济复苏的差异，再次验证了这一点，过去两年中，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，而远隔大洋的欧元区经济还在负增长中徘徊。

欧洲需要什么？需要改革开放。但主动改革开放，何其难也。债务危机已经在倒逼欧洲各国进行改革，但是步伐很慢，协调不力；在开放方面，我们看到欧洲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，中国人去购买土地或厂家纷纷遇阻。反观中国自己的历史，经历了鸦片战争，经历了甲午海战，经历了抗日战争，牺牲了三千万人，还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。由此判断，欧洲的觉醒还需要假以时日，欧洲的问题远未结束。

成长的烦恼

始于2008年的欧美金融动荡，对东西方世界格局有怎样的影响？我们怎么去研判？冷静地看一看，大概有五个判断。

第一，不改变发达经济体衰退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趋势。东西方的主要差别，在于他们早一两百年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，过去的三十年



《经济学人》的封面，美国人对中国的忧虑与日俱增

我们迎头赶上。印度比我们改革开放晚了13年，我们始于1979年，他们始于1992年。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，只是起步的时间不同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。发达经济体渐趋饱和，新兴经济体保持增长。

第二，加速了这个趋势。

第三，发达经济体的加速衰退，拖累了新兴经济的崛起，形成了一个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。欧洲人原来是高福利高消费群体，

他们要真是开始节衣缩食，受打击的可能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东西方经济体的博弈，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涨彼消的过程，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。

第四，金融危机使得很多传统产业退出历史舞台，竞争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东西方第一次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。问题是靠什么去竞争？是更多地依靠市场，还是行政之手和产业规划？危机三年后的今天，依托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，美国创造了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，而过去三年中我们全国各地大干快上的是光伏产业，今天全行业亏损面已经超过60%。

第五个，世界围堵中国的步伐加快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就是中国周边的很多国家，经济上都在依赖中国，政治上却在反对中国。南海正在成为全世界最复杂的海。一个黄岩岛，菲律宾来了，越南来了，还可以理解，但是印度人也来了，日本人、美国人、欧洲人都来了，有点超出大家的想象。为什么？中国的发展太快了，世界以复杂的心情参与到南海的纷争，或许并不是为了领土、领海，或者石油，而是来对中国的



崛起表了一个态。某种意义上，南海事件是中国真正迈入大国时代的标志。

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，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，突然跻身于全球俱乐部中，可能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但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出来了，这是成长的烦恼，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吴晓灵同志最近有句话讲的非常好，她说“做好自己的事情”。我觉得这是惟一正确的答案。

2000年前后，世界开始流行“中国威胁论”，100年前，世界上最流行的是“美国威胁论”，因为美国那时候正是发展最快的时期，正在全面超越英国和欧洲列强。那时候围堵美国的急先锋，一个是英国，一个是德国。尤其是英国，本是同祖同宗。但看到美国发展得快，又要过去投资，分享它的成长，时冷时热的状态持续了五十年。直到美国完全超过英国，两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简单了，小布什说他要打伊拉克，布莱尔说他第一个报名。地缘政治最终取决于一个因素，实力。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，可以预见，中美关系、中日关系、中欧关系，在未来的二、三十年，将是这么一个锯齿般的关系，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，也不会降到冰点。对今天的中国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坚定不移地成长，保持发展，保持稳定，推进改革。

温州是中国的缩影

中国的温州很有意思，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，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，为什么？缺钱。这就很荒唐了。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，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，到山西去炒煤，到新疆去炒棉花，到澳大利亚去炒房子，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都买不起房子了。

温州是今天中国的缩影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最缺的是钱，改革开放30年后，我们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，从1978

年到2011年，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加了约1619倍，而同期GDP增长了178倍。我们有钱了，但却突然发现，这些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找不到投资方向。温州凸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，即金融市场不发达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，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，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近年来中国最火爆的电视节目，《非诚勿扰》算是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应该是和中国社会找对象难有关。一大批大龄男青年，一大批大龄女青年，就是找不着对象，为什么？缺乏一个互相了解、信息沟通的平台。现代社会可能节奏也比较快，工作比较忙，大家没有时间去宣传自己，一咬牙，把自己IPO了，上了《非诚勿扰》。中国经济亟需一个能让企业和资金找到彼此的“非诚勿扰”的平台，这正是今天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。

怎样做呢，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。这两年股市不太好，大家对IPO意见很大，说中国每年有300个IPO，太多了。最近大家都知道，中国证监会把所有排队IPO的企业名单预先公布出来，大家一看，有500多个企业在排队。

而与此同时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，都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寻求IPO资源，因为他们的经济没有增长。美国华尔街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？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经济发展比较成熟了，没有那么多上市资源了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失去了目标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去做各种复杂衍生品了，最后自己摔了一大跟头。中国有这么多上市资源，纽交所也好，伦交所也好，纳斯达克也好，一直在中国转。一边是有大量的上市资源，一边是中国社会有很多钱，这些钱也正需要投资于这些正在成长的企业，否则怎么保值增值呢？从这些因素来分析，市场缺乏一个对接的通道或平台，或者这个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。所以首先是怎样去拓展市场体系的问题。十万红军到了湘江，发现只有一座浮

桥，叫IPO，怎么办呢？只有再架三座浮桥，第一叫债券，第二叫三板，第三叫PE。

我们还要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。为什么？一方面，像浙江这样的省份，销售额过亿的企业超过一万家，不可能都来上市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个牌，公司得以改制，完善治理结构，有个价格，有人买它，有人卖它，有个市场约束，就会一天比一天好，中国经济会上一个新台阶；另一方面，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，半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，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，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，那么，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周边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，来融资，东突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。中国的发展，还是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，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战略。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，还有南宁，辐射东盟经济体；还有海西，辐射台湾，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来融资，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。当然，区域性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要保证基本规则全国的统一性，防止一放就乱，这方面，秦始皇有个做法值得借鉴，叫做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。

其次，建立了这些市场，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不能欺诈，不能编造业绩，不能隐瞒经历，不能只想着来圈钱，不能操纵市场，不能搞内幕交易，要有有效的监管。听说有一个在逃犯，本来潜伏了13年，去了一次《非诚勿扰》的节目，被抓走了，这有一点像“绿大地”¹。第三，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。所以我们在推动鼓励分红的机制，推动退市机制，这都是今年在努力推动的一些事情。

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。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——

换手率比较高，曾经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过900%，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市场，只有200%，而发达国家在100%左右。这两年市场低迷一些，换手率下降了不少，但仍旧是全世界最高之一。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，比较活跃，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过于投机，也是很危险的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，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。所以，我们要推动中国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。一方面，长期资金是相对稳定的；另一方面，因为它一般也是大型资金，会有专业化的管理，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。

应该说，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多年，跨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，但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多先天不足。改革开放早期，中国有一位到美国的留学生，他后来成为了华人中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，他回忆说，大部分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，需要从零开始，因为他们原来学习的是理工科，而他自己原来是学经济的，所以要从负数开始，因为他原来学习的是计划经济。可以说，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从负数开始，它脱胎于计划经济，早期的市场由国有股份完全主导，市场文化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。因此，我们的市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，改革的步伐举步维艰，就不奇怪了。但我们应该记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话，叫做第一不要怕犯错误，第二发现问题立即纠正。我们应该坚持这个态度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，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。本文根据作者2012年3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讲座及其他讲座整理而成，收录于《未来十年——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》一书。）

1. 2011年3月，云南“绿大地”公司欺诈发行上市案发。